

加拿大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加拿大华裔作家郑南川访谈 □吴秀峰 郑南川

吴秀峰：郑老师好！您曾将自己的诗歌创作描述为“自然写作”与“草根创作”，即注重书写日常生活，提倡语言表达通俗易懂。有学者认为，您的“草根创作”是对20世纪20至30年代蒙特利尔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以及兴起于1960年代温哥华的“蒂什”(TISH)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不自觉的回应，“并赋予其鲜活的时代特征，体现出华裔新移民在多元环境中的精神风貌”，您能否具体谈一谈您对加拿大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认识，以及它们对于包括您的作品在内的加拿大华人诗歌的影响？

郑南川：20世纪初期，加拿大诗人在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马拉美和魏尔伦等人影响下，形成了“蒙特利尔派”，开启了诗歌革命。时至20世纪中期，米隆和他的文学友人创建“六边形出版社”，对魁北克诗歌改革和民族意识的兴起起到关键作用。与此相对的是，法语诗歌创作更为大众化和民族化，从爱情、宗教、自然和艺术各方面，书写魁北克人内心世界的坎坷与情怀。总体而言，20世纪前中期的魁北克法语诗歌在题材上走向平民与世俗生活，注重描述街头普通生活和生存环境，反映人们的精神与政治需求，具有独特的史诗特征。

吴秀峰：您提出我的诗歌是“草根创作”，是“对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不自觉的回应”，对于这种观点，个人认为除与我在学习法语过程中大量阅读魁北克诗歌，并且受到吉尔·维尼奥等诗人启发有关外，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其一是我对诗歌的理解。我之所以倡导诗歌写作应注重语言简单、形式大众化且通俗易懂，是因为我认为诗歌必须来自生活，而不是创造一些远离生活，连同自己都无法辨识的语言以蛊惑人心。在我看来，诗歌的文学性不在于语言、修辞与意象的罗织陈列，这只是形式的意义。诗歌的终

极目标，是通过诗的形式表达出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表现诗人对生活的哲学思考。到目前为止，我共出版了6部诗集，在这些不断成长的创作经历中，我最深刻的感受是，诗歌必须蕴含人性的精神，揭示人性的本质与爱，表现“人”的哲学观。

其二是我的出国留学经历。在1988年出国留学后，随之而来的“新移民生活”让我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也使我第一次睁眼看世界。从个人感受来说，我对外面的世界根本不了解，更没有实际地接触过。因而，我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表达着一种我对新世界的迷惑和探索，承载着人生悲切与欢乐的交织情绪。这一点与蒙特利尔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启蒙状态与形式很相似。

其三是我对魁北克文学与文化氛围的认同。我一直认为魁北克文学具有强烈的“草根性”，因为其大都是在描写城市的街头巷尾与平民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前面谈到的20世纪前中期的魁北克诗歌充满着悲切、挣扎与渴望，是因为此时的魁北克人正面临着对国家、民族与法裔文化的认同，而这些也是刚出国时的我所必须要面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生阅历的加深，这些年来我深切地感悟到，自己对于魁北克越来越具有认同感。我的诗歌，就是魁北克自然主义和草根色彩的表达。在我眼里，魁北克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但是，我们的文学却出奇的精彩，因为我们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风格走出家门。

吴秀峰：您不仅在诗歌与小说创作中关注“移民新生活”，还对文学史范畴中的加拿大移民文学很关心，曾提出“新加拿大文学”的概念，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移民文学。我想请您谈一谈这一概念产生的背景与理论内涵，以及华文学在“新加拿大文学”中的位置与意义。

郑南川：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移民文学出自移

民之手，存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内容上涉及本土与移民生活本身，但又可能在思想上偏离本土文化精神，直接延续输出的生活价值观和生活内涵。移民文学的这一概念让我意识到我们的很多移民写作者，没有从根本上置身于加拿大，视自我为加拿大人，真正书写我们在加拿大的命运。“新加拿大文学”的概念，正是针对加拿大的新移民文学而提出的。它的主要特征表述如下：

首先是试图解决写作者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使其实现文化身份的本土化转变。这就要求写作者应具备“新加拿大人”的主人翁精神，放弃“外来人”情绪，站在加拿大人的位置上写作。

其次，若要实现作家身份及其创作的本土化，那么作家本人应有相当长的一段新加拿大生活的体验或经历，了解和认识加拿大新生活的特征和方式。简言之，作家自身对加拿大文化的感受，需要一个公正理解的过程，而不是用自我文化的意识传统取代对现实的全部认识。

最后，加拿大文学与中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应注意加拿大文学描写的是华人在加拿大的移民生活。这种生活具有加拿大特征，是加拿大文化的一部分，其文学书写与加拿大文学息息相关，而与中国本土文学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对于中国国内读者而言，这也是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

吴秀峰：尽管研究者们多强调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魁北克的归属感与文化身份认同意识，但是我注意到您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您与魁北克华人作家们是用中国文化的遗产，在加拿大书写你们作为魁北克人的精神。请问在您看来，华文学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而中华文化对于华文学又有何意义？

郑南川：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华人作家来说，

是最重要、最难，也是最应解决好的问题。我个人三十余年的出国经验证明，从你出生、读出第一个母语的句子开始，你的文化根基就注定伴随你的生命过程，影响你的一生。我与魁北克的华人作家们既是加拿大人的一分子，是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又是承载与传播中华文化的一分子。因此，虽然我们在作品中展示的生活场景属于加拿大，但是其中也包含中华文化的成分。更进一步地说，华文学要表达的是中华文化与加拿大本土文化的不同之处。这是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且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以加拿大为例，中华文化对于华文学的意义与作用在于：第一，从世界文学层面来说，实现不同文化特征文学的相遇与融合，是世界文学的最终目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本身就承担着这一责任。第二，对于拥有上百万中国人的加拿大而言，大中华文化是其无法分割的组成部分。这就促使加拿大需要有一个加拿大式的华文学，真实地表达中国人及其所属的文明在这个国家的意义。第三，从海外华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的关系来说，华文学承担着怎样从中华文化的祖地文明与精神中汲取养分，从而创造和修改文学的命题。就此而言，加拿大多元文化中的中华元素也是加拿大文学天然的颜色与应有的成分。

吴秀峰：据我所知，您在坚持写作的同时，还长期从事华文学的组织与实践，曾参与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的创建，并担任数届会长。在此期间，您多次发起举办全国性的华文学活动，并积极促进中加两国作家的交流与合作。可以说，您为加拿大华文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作为魁北克乃至加拿大华文学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您对于加拿大华文学的未来发展有着怎样的期望？



郑南川：自1988年出国留学以后，由于人生道路的彻底改变，我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并且由此见证了加拿大华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过程。客观地说，加拿大华文学的发展是比较艰难的，不仅面临着如何认识自身与如何创作等困境，还必须解决作家的个人生存、创业与文化认同等问题，具体经历了记忆文学、乡愁文学、中国文学的延续、移民式文学等等不同阶段。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世界已经融为一个“世界村”，加拿大华文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更为丰富多样。与此同时，中文已成为加拿大的第三大语言，甚至存在超越法语成为第二大语言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华文学的意义与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加拿大华文学正处于兴盛和大发展时期，不仅在加拿大文学史中占据显著位置，而且已成为北美乃至世界华文学的重要力量。一个更成熟的、更富有活力的加拿大华文学正在形成。(吴秀峰系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自上世纪60年代始，就陆续有中国台湾、香港的留学生前往欧洲求学。瑞士赵淑侠的《我们的歌》《塞纳河畔》等反映旅欧华人留学、生活的长篇小说曾风靡一时。此后又有吕大明、朱文辉、杨翠屏、颜敏如、丘彦明、池元莲、绿绮士、麦胜梅、林涓等，以不同体裁描述各国风土人情在欧洲华文文坛上各占一席之地。从80年代始，有数十万中国留学生以及新移民、“外嫁女”等移居欧洲各国，他们在异国他乡如何打拼、生存，怎样融入异邦的社会生活，也有了众多华文文学作品的书写与描绘，如关惠谦的《情》《缘》，章平的《红萍萍》三部曲，谢凌洁的《双桅船》，余泽民的《匈牙利舞曲》《纸鱼缸》，穆黎华的《情事》《归梦湖边》，方丽娜的《蝴蝶飞过的村庄》《夜蝴蝶》，刘瑛的《不一样的太阳》，朱颂瑜的《把草木染进岁月》，老木的《新生》，安静的《萨尔茨堡有张床》，阿心的《爱按门铃的劳尤什太太》，昔日的《两乡情悦》等。然而，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生活在塞纳河畔、多瑙河边的欧籍华人的命运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担任法华作家协会副主席和秘书长的旅法华作家黄冠杰，曾出版过散文集《果园与足者》和诗集《黑夜散开》，他的诗苍劲深沉，画面感十足，具有强烈的艺术张力。比如《巴黎 从一杯咖啡开始》写“我”这个漂泊者在巴黎咖啡馆与周围环境(西方世界)的格格不入：“我坐在那个角落/面对着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我有点不知所措/咖啡香得这么张狂/一点都不顾及/我籍籍无名的身份”，把一个从中国乡间跨出国门，来到“花都”巴黎后异乡人的陌生感与孤独者的无措感，抒写得格外真切：“我习惯了茶的沉静/对咖啡的张狂/就有些坐卧不宁”；“剩下的时间，足够我把咖啡的苦逼喝成厚重”。茶的沉静与咖啡的苦逼，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意象，成为华人身份认同的不同隐喻。

今年，黄冠杰又发表了散文新作《老树》(载2022年1月《欧华文艺》第56期)，该文一开头写作者的屋外有一棵老樱桃树。“由于平时采访忙，我对这棵树也基本上是熟视无睹。真正让我注意到它，还是法国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次封城。一封城，我们改成居家办公，侨社活动全停了，现场采访也都改成电话采访。足不出户，我忽然‘发现’了这棵树。”因为，“那时候，听着揪心的一日日不断感染、死亡的数字，看着黑黝黝的枝条，盼望着赶快开花。因为有研究者说，等天气暖了，疫情就会过去。但是花开了，花谢了，疫情仍没有停止的意思，直到看到果实一日日膨胀，数字才一日日瘦下去。所以，这一次的收摘果实便有了别样的意义。”这棵老樱桃树无疑成了承载疫情期间作者一家悲喜交集的寄情之物。“落红不是无情物”，自然景物通过“移情”有了情感意义。作者的妻子格外垂怜这棵由前房东老夫妇留下的樱桃树，不惜花钱请来果树修剪师为其修整。这是修剪师却说树龄太长，已经开始慢慢死亡了。一棵表面上繁花似锦、果实累累的樱桃树，竟已渐渐步入死亡。这似乎含着某种隐喻：某些表面上看似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谁料到已是大厦将倾，走向衰亡？“这让我想到我们的身世，去国离乡的一群，正像这棵老树。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向下伸展我们的根须，我们只能抓住浅浅的一层。我们的养分还是来自内心。”作为华夏子孙，无论身处何地，必须要使自己内心强大，才能将“养分”供给全身，不致生命枯萎。这或许正是无情的疫情所给予作者思考海外华人及自身命运的鞭辟入里的命题答案。

身居匈牙利的余泽民，在中篇小说新作《天笼》(《江南》2021年第6期)中，以魔幻现实主义的笔致，展示了一位在布达佩斯不幸染上新冠病毒而死亡的华人移民“我”的亡灵，在离开肉身而对前世的追忆与忏悔。小说秉承了余泽民由《匈牙利舞曲》《纸鱼缸》等作品一贯的对于东欧华人移民在异国他乡生存和生活现状以及生命、爱、欲望、命运及其情感世界的关注与描述，但不同的是，此篇更为注重对他们客死他乡后的“灵魂”归属的叩问与生命意义的审视，因而更具有震撼力与颤感性。

《天笼》书写病亡的“我”的躯体尚留在布达佩斯F区圣约翰医院病床上，而“我”的灵魂却已溜走，第一个念头



老树的启悟与“幽灵”的忏悔

——评近期两篇欧洲华文作品 □钱虹

是“我自由了”。自由的“我”的灵魂弃绝“我”的皮囊而去。溜出病房的“我”看到了新冠时期圣约翰医院的更多实景。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而后弃医从艺的余泽民，犹如弃医从文的鲁迅那样，“所仰仗”的医学知识同样给了他对新患者的病态、神志与心理以精确准确的描述，无论是不断被送进医院需要抢救的病患，还是兢兢业业对病人乃至亡者悉心照顾的医护，都有令人信服的细节描写作为叙事支撑。

《天笼》中“我”的亡灵对于不幸的个体命运以及华人的伦理悲剧做了回应与叩问。疫情期间海外华人移民的现实处境，到底有多艰难？“我”之亡灵告诉读者：“回想一年多漫长的、令人绝望的隔离，餐馆被迫停业导致的一系列难以应付的危机，我就会感到不安。你想啊，政府下令封城，宵禁，强制性停业，可房租水电费仍要照交，公司和个人所得税一文未减，人家的大饭店多少能得到些政府补贴，但我开的那家‘棕榈山快餐’只能自生自灭。”面对生存困境已属不易，更遑论伦理道德上的不安：“我”先是躺在病床上眼睁睁看着受新冠病毒感染的老父亲咽气而无法动弹，后想起他看着其骨灰带回福建老家安葬的遗憾，生前无法执行，死后如何做？“我和父亲最后都没能归根。”父子两代人双双命丧异国他乡，落叶无家归根，这恐怕是重视人伦亲情的炎黄子孙最痛彻心扉的伦理悲剧，无论他是否入了别国国籍。余泽民用手术刀一般的犀利笔触，挑破了结在不少海外华人胸口最为疼痛、甚至死不瞑目的厚痂。小说中不仅仅是父子间的伦理悲剧，还有夫妻、亲子之间生死两别的家庭悲剧。

《天笼》中“我”的幽魂对于自己抛家别妇闯东欧，25年来“当一台挣钱机器”做了反思与忏悔。当年，骨子里不安分的“我”赶上赴东欧淘金的大潮，跨上了横穿西伯利亚的K3号国际列车。到了布达佩斯，靠福建同乡的指点和帮忙，“先贷货练摊，然后跟谁凑钱拼租，百货店的钱不好挣了，就改开餐馆，中餐馆开不下去了，改做快餐，生意虽然几起几落，餐不上收口，但汇回家里的钱也够阿芳母子盖一栋小楼，多少弥补了心里的愧疚”。其实，赚了钱的“我”不但有了异国情人伊伦娜，生下了混血儿子托米；还把在布达佩斯购置的首套房过户给了她，托米买了辆新车，“是我提前为他准备好的成年礼”。不过后来因“我”已有家室事发，伊伦娜把“我”和老父亲扫地出门，自己不久又有了新欢，托米也只能隔两三周跟“我”吃一顿饭。为了能保住福建老家之“根”，对于发妻始终隐瞒实情，“我担心到头来我会鸡飞蛋打，落得一个两头不是人”。只有成了幽魂，命丧黄泉的“我”才意识到：“我的所有努力到头来都是自欺欺人”，为自己“曾经犯浑和残忍感到懊悔”。迟到的忏悔已于事无补，走出“记忆隧道”后的“我”，与“由无数镂空的剪影组成的魂灵大军”一起被昊天爷收入“天笼”，“成千上万的魂灵在寂静中被压缩成沙丁鱼罐头，他们不再是独立的，更无所谓自由”。最后放出天笼变成了一朵飘荡的白云。余泽民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以诗意浪漫的笔调，揭示出了无情的人生归宿与残酷的生命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余泽民的《天笼》不仅仅是一部疫情时期饱蘸海外华人血泪的忏悔录，更是一部叩问人的终极生命意义的“道德经”。在哲学和伦理层面，它超越了一般书写海外华人命运的大多数华文作品。

匈牙利华文女作家阿心，本名翟新治，原籍河南郑州，曾为郑州市作家协会会员，1991年因为经商开始定居匈牙利，现为匈牙利华人作家协会副会长、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协会会员、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会员。对阿心来说，经商是主业，是生存的物资基础，文学创作则是业余爱好。虽然如此，正如阿心所说的那样，文学一直是她“精神的家园”，亦即超越物质生活与追求精神生活的一种有效方式。

阿心的文学创作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与人合著的作品集曾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而定居匈牙利之后三十多年来，阿心更是在经商之余笔耕不辍，在《百花园》《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综》(香港)《香港文学》《世界日报》《欧洲时报》等海内外报刊发表大量作品。2018年，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爱按门铃的劳尤什太太：阿心作品选》，精选与汇集了阿心小说、散文90余篇，较为集中地展示出了她的文学成就。2019年，阿心又迎来一个创作丰收年。小小说《我不是个好老板》等发表后不仅连续被《小小说选刊》转载，而且被收入《2019年中国微型小说年选》。

阿心作品以崇尚真善美为旨归，思想健康向上，风格清新俊朗，具体又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体裁上主攻小小说与散文，尤其在以小小说选刊上彰显独特个性；二是以旅匈华人生活为主体，广泛描写跨国生活，着力展开跨文化文学书写。而阿心跨文化写作最突出的思想价值与社会意义，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精神鼓舞下，围绕世界各国各民族和平友好相处的总主题，真诚歌颂中匈人民的友好交往，并通过展示中匈文化的交往、碰撞与交融，着力架构中匈和平友好的文化桥梁，从而为增进中匈两国人民友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心称得上新时代中匈文化丝路的美丽使者。

描绘匈牙利美丽风光，歌颂匈牙利人民的优秀精神品质，是阿心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阿心深切体会到，匈牙利地处中欧，多瑙河穿境而过，风景十分美丽迷人；匈牙利人民热爱生活，思想质朴，性格乐观开朗。在许多清新优美与短小精悍的散文篇什里，阿心情不自禁地赞美她人生第二故乡的风土人情之美。《春到多瑙河》描绘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多瑙河两岸的自然和人文风情，令人神往：春暖花开，多瑙河水波光粼粼，河上一座座大桥造形别致，庄严的国会大厦显现着典型哥特式建筑风格，旧日皇宫高大而巍峨。《永远的巴拉顿》与《又见巴拉顿》均表达对有600平方公里之大的中欧最大内陆湖——匈牙利巴拉顿湖的礼赞，写湖水中游泳的惬意和休假的快乐，写巴拉顿湖湖面的辽阔和湖光山色的美丽，也写匈牙利人的开朗、热情，感慨上天对匈牙利人慷慨的馈赠。《匈牙利人与花》写匈牙利人“爱花如命”的习性，写匈牙利花市的繁盛，更写出爱花习俗中匈牙利人对美、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布达佩斯不相信眼泪》通过生活点滴表现匈牙利人民的坚强乐观——比如地铁出了故障，人们拥挤在公交车上，但人群中的一名男子却“幽默地报站名、街名、方向”，让人们忘记“烦恼和不快”。《感受匈牙利文明》多方面展示匈牙利日常生活中值得借鉴的文明风习：公交车上人们争相给老弱病残者与孕妇让座，司机车中总是礼让行人，车行路途遭遇故障总会得到好心人的主动帮忙与解困，人们在寒风中井然有序地排着长队进场去观看大画家莫奈的画展。此外，小小说《好警员坏警员》通过匈牙利警察热情、细心、周到地为旅匈华侨驱车带路一事的书写，表现了匈牙利警察的廉洁与热情。

歌颂中匈人民之间的真诚友谊，展示中匈文化的交往与融合，是阿心作品的主旋律。阿心深知，旅匈华人生活在匈牙利，不仅需要与匈牙利人打交道，而且需要融入他们的文化当中；而旅匈华人在与匈牙利人民的交往中，既会遭遇中西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会显现彼此文化之间的融合，乃至最终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消除隔阂，守望相助，结下真诚友谊。在小小说《爱按门铃的劳尤什太太》中，中匈两位女邻居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矛盾、冲突的过程，也是增进理解、化解矛盾与建立真诚友谊的过程。劳尤什太太中年守寡，有儿子要养大，生活较为拮据，爱干净，讲公德，性格直率，为人仗义。“我”作为旅匈华侨，与隔壁邻居劳尤什太太的关系经历了多次的小摩擦，最终成为相互信赖的好邻居、好朋友，最初的误会、文化的差异都被最终的相互理解、热心相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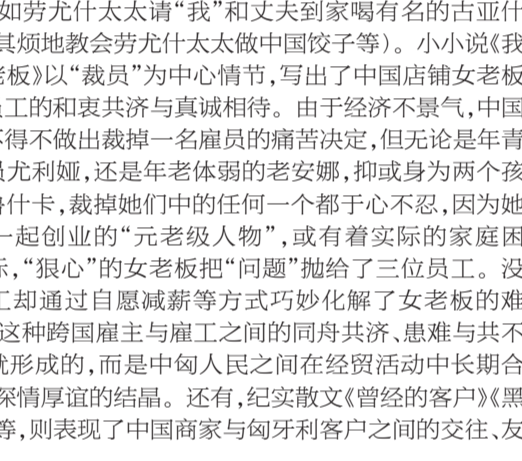
中匈文化丝路的美丽使者

——旅匈作家阿心与她的跨文化写作 □吴道毅

与礼尚往来(如劳尤什太太请“我”和丈夫到家喝有名的古亚什汤、“我”不厌其烦地教会劳尤什太太做中国饺子等)。小小说《我不是个好老板》以“裁员”为中心情节，写出了中国店铺女老板与匈牙利女员工的和衷共济与真诚相待。由于经济不景气，中国店铺女老板不得不做出裁掉一名雇员的痛苦决定，但无论是年青敬业的收银员尤利娅，还是年老体弱的老板娘，抑或身为两个孩子母亲的比鲁什卡，裁掉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于心不忍，因为她们或是当初一起创业的“元老级人物”，或有着实际的家庭困难。两难之际，“狠心”的女老板把“问题”抛给了三位员工。没想到三位员工却通过自愿减薪等方式巧妙化解了女老板的难题。很显然，这种跨国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同舟共济、患难与共不是一天两天就形成的，而是中匈人民之间在经贸活动中长期合作、彼此结下深情厚谊的结晶。还有，纪实散文《曾经的客户》《黑眼睛蓝眼睛》等，则表现了中国商家与匈牙利客户之间的交往、友好与信任。

在表现和歌颂中匈友谊时，阿心还注意到跨国婚姻或跨文化工作者事迹中开拓题材与提炼主题，在更高层次上展示中匈文化之间的交往与融合。阿心注意到，通婚是各民族文化融合最直接、最常见的形式，不仅能够有效增进各民族文化的彼此了解，而且能够深入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认同；而在新时代，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匈经贸、文化友好往来进入发展快车道，展现光明前景。纪实散文《多瑙河畔的中国外嫁女》通过描述中匈之间的跨国婚姻，歌颂中国女姓与匈牙利男性之间的美好爱情，也表现了中匈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Z大姐、M老师都是上世纪50年代生活在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她们分别与来自匈牙利的外交官卡尔丹与留学生高先生自由恋爱，结成了跨国家庭，定居于匈牙利。对这两对夫妻来说，虽然相互间都存在语言的障碍与文化的差异等，但他们却在生活中不断克服障碍、消除差异，收获了爱情与家庭幸福。尤其是，M老师作为布达佩斯罗兰大学中文系教授和匈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曾翻译或合译《裴多菲诗选》等不少匈文作品，为匈中友好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她的丈夫高先生是匈牙利著名汉学家，生前曾把《鲁迅短篇小说选》等翻译成匈文，为增进匈中友好付出了毕生精力。

纪实散文《漫漫丝路上的行走者》发表于2020年9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被称为“漫漫丝路上的行走者”的三位旅匈华侨，正是为新时代中匈经贸、文化友好往来做出卓越贡献的有功之臣。老顾，利用匈牙利在欧洲第一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时代契机，不顾旅途劳累与病痛折磨，多次往返两国之间，促成匈牙利奥尔拜蒂市与中国西宁市结成友好城市。之后，老顾继续为两国经贸、文化友好往来牵线搭桥。余泽民，既是作家又是翻译家，创作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书写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出版译著《灿烂》《撒旦探戈》等作品，其荣膺匈牙利政府颁发的“匈牙利文化贡献奖”，可谓实至名归。赵大夫，擅长针灸，精通太极养生之道，二十年如一日运用针灸等医术治好匈牙利患者无数，还组建匈牙利妇女养生太极队养生健身，传播中国养生文化。对这些新时代丝路上的行走者来说，“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还是文化文明之路”。各民族、各种文化的相互包容、沟通与交融，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旅匈作家阿心与她的跨文化写作

□吴道毅

与礼尚往来(如劳尤什太太请“我”和丈夫到家喝有名的古亚什汤、“我”不厌其烦地教会劳尤什太太做中国饺子等)。小小说《我不是个好老板》以“裁员”为中心情节，写出了中国店铺女老板与匈牙利女员工的和衷共济与真诚相待。由于经济不景气，中国店铺女老板不得不做出裁掉一名雇员的痛苦决定，但无论是年青敬业的收银员尤利娅，还是年老体弱的老板娘，抑或身为两个孩子母亲的比鲁什卡，裁掉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于心不忍，因为她们或是当初一起创业的“元老级人物”，或有着实际的家庭困难。两难之际，“狠心”的女老板把“问题”抛给了三位员工。没想到三位员工却通过自愿减薪等方式巧妙化解了女老板的难题。很显然，这种跨国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同舟共济、患难与共不是一天两天就形成的，而是中匈人民之间在经贸活动中长期合作、彼此结下深情厚谊的结晶。还有，纪实散文《曾经的客户》《黑眼睛蓝眼睛》等，则表现了中国商家与匈牙利客户之间的交往、友好与信任。



加拿大华人艺术家王俊杰作品